

10.12

南长文史资料 专辑

海峡两岸情

HAIKIA LIANG'AN QING

第二辑
1989.8



政协无锡市南长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
1. 定居大陆的五年……………卢裕康(1)
 2. 爱国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博士诞辰百年纪念
……………林祖铭(4)
 3. “足适屨以健行”
——记陈立夫为贝贝制鞋公司题字……………林颂勋(16)
 4. 振业橡胶总厂祝贺陈立夫九十寿辰……………钦 颂(17)
 5. 介绍无锡旅台同乡会人事设施……………吴伟勋(18)
 6. 鍾蕙荪先生和《山明水秀的无锡》
……………吴伟勋、周梦熊(23)
 7. 姚冬声病故纽约……………吴伟勋(26)
 8. 挚友重逢的感想……………吴伟勋(72)
 9. 慈母回乡 童心犹见……………朱秋香(28)
 10. 让孩子记住:“我们的根在这里”……………刘含光(31)
 11. 游子归乡吟……………聂云岳(34)
 12. 愿将科研成果移家乡……………吴鑫锡(38)
 13. 怀着疑虑来 载着满意归
……………南长区台胞接待站供稿(40)
 14. 白驹先作客 无锡见老母……………莫琍琍(42)
 15. 听探亲老兵一席谈……………莫补臣(45)
 16. 寄语彭哥……………维 以(48)
 17. 思念胞姐曹修勤……………曹修默(50)
 18. 一片深情为台胞……………南长区台胞接待站供稿(51)
 19. 涵碧楼的腾房风波……………林祖铭(52)
-

定居大陆的五年

卢裕康

1984年7月，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同妻子庄秀妹和两个女儿，由台湾绕道泰国，经香港回到无锡同老母亲欢愉团聚，瞬息间已是五年了。看到祖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得的巨大成就，各项建设蒸蒸日上，人民生活得到普遍提高，社会呈现安定团结的局面，内心无比高兴。在此期间我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这里简述二三事：

乐作牵线搭桥人

早在1982年2月，当我由台湾出差到香港洽谈业务时，第一次要回大陆，那时有六位大陆去台朋友，要我帮助他们寻找在大陆的亲人。这六位朋友中，有三位是无锡人，还有三位家在苏州、湖北应城和江西上饶。其中五位是国民党部队的校级退伍军官，一位是台北县四海工专的中校军训教官。初到家乡，我思绪万千，惊喜参半，并沐浴在亲情的温馨里，但当想到在海峡彼岸朋友的托付和朋友亲人的期待，就顾不得旅途辛苦和亲人聚旧，仅凭友人提供的几十年前的旧地址奔赴苏州和我市的江阴、前洲探访朋友的亲人，外省的则用通信方式取得了联系，均促成了他们相互之间的通信、通汇及返回大陆探亲。

自电台和报纸报道了我定居无锡的消息后，有很多台属乡亲来访来信，托我设法为他们寻找去台亲人的下落。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思亲之情，很乐意为他们转信作牵线搭桥人，或者去信托在台湾的岳父代登“寻人广告”，使常熟市高超同志

与在台东的儿子取得联系。

1985年6月，我应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并以来自台湾凤山的黄埔后期学员的身份向大会作了《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发言。我为海峡两岸的黄埔同学联络、接待做了一些工作。1985年8月，我和妻子专程去广州华侨大厦与来自台湾的一位陆军少将会晤。我和他是黄埔23期同学。我们向他详细介绍了回大陆定居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使他消除了疑虑，坚定了回广东老家探亲的决心。

1986年7月，我全家去北京旅游，并接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空中之友”节目主持人徐曼同志的采访，把我全家在大陆生活的点点滴滴分五次（每次十五分钟）向台湾播出。自1987年11月2日台湾对大陆探亲政策开放以来，我先后接到来自台湾的或回大陆探亲者转来台湾朋友的来信二十余封。在今年初，还接待了黄埔同学25期的陈先生，还有唐、吴及妻兄庄先生。他们是收听到了广播或看了录像片，才确知我全家已回家乡定居，揭开了全家突然“在台失踪”之谜。

身在福中深知福

1987年，我有幸参加了市政协举办的“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宣讲活动。由于我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六年和在大陆定居三年，对于两种社会、两种制度，有切身的感受。因此在宣讲活动中，我以“身在福中深知福”为题，向广大群众作了八十五场次的报告，也到过南京、常州、南通等地宣讲。对象有学校师生、工厂职工和机关干部。有一次向308部队的27个研究单位的同志宣讲时，因台上台下感情十分融洽，会场秩序井然，使我极受感动和鼓励，竟忘了时间，一下子讲了三个小时（原定二小时）。

在宣讲活动中，对我的“去台、在台、离台”经过的叙述，大家寄予深切的同情；我对两种社会、两种制度，以及对台湾和大陆生活水平做的分析、比较，大家认为是实事求是的；我对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身在福中深知福”的认识，大家也认为是正确的。广泛开展的“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宣讲活动，使大家更加坚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真正的出路。

当选“标兵”感受多

全家定居后，在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号召下，在政府、人民的帮助下，我的家庭先后被评为街道、区、市、省“五好家庭”，最近又被评为全市的“五好家庭”标兵户，更深受激励和促进。“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对我家庭的教育愈加深刻，深知改善社会风气，必先以改善家庭风气为起点，因为家庭是国家的组成细胞，大多数家庭成为“五好家庭”，则社会将出现一种崭新的风气。记得法国自由思想家卢梭说过：

“……只要父母之间没有亲热的感情，只要一家人的聚会不再使人感到生活的甜蜜，那末不良的道德，就势必来填补这些空缺了。”我国谚语云：“远亲不如近邻”。因此，我在日常生活中，特别重视家庭的融洽和邻居的和睦相处。我要求自己和要求子女做到这样四条：（一）尊敬长者；（二）勤俭节约；（三）知足常乐；（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深切的体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作用。让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同德，振奋精神，自觉地遵守纪律，服从大局，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为实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为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努力。

爱国的著名地质学家

翁文灏博士诞辰百年纪念

林祖铭

“……象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摘自《毛泽东选集》：“论十大关系”

翁文灏博士，是我国现代地质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近代科学史上的著名人士。在国内，他曾任由蔡元培先生领导的全国最高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会秘书，兼任北平研究院地学组长，后又当选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在国际上，他被提名为伦敦地质学会的国外名誉会员，德国赫勃自然科学院的通信院士和柏林工科大学的荣誉博士，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经济地质学会和采矿冶金学会的名誉会员等荣誉衔名。

今年是翁文灏博士（1889—1989）诞辰一百周年，我们约请其哲嗣翁心鹤工程师撰文纪念。

翁工系我区人大代表，因急于首途去京，出席全国七届二次人代大会，乃将其旧存积稿，供我们选择。我们不揣简陋，从翁文波、翁心鹤、翁心钧三先生的早年成稿和参考其他有关资料，将翁博士的史迹，学术著作及其在国际科坛的影响，与部分诗作，编写本文，以为其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一）

翁文灏，字咏霓。识者常尊称为“咏霓先生”。1889年7

月29日生于浙江鄞县，1971年1月27日病歿于北京。

翁文灏于1902年(13岁)就读私塾，后中秀才。1906年入上海震旦学院，两年后初期毕业，参加浙江官费留学生考试得第七名，1908年秋派赴欧洲官费留学，入比利时罗文大学专修地质学，1912年获理学博士，是我国得地质学博士的第一人。

1913年回国至北平，任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授。1926年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地质调查所以调查全国地质、矿产、土壤、水力、水利及办理与地质有关的实业计划等为职务，内设图书室。陈列馆及矿物岩石研究、化学试验、古代物学研究、地性探矿研究等室。所长一人，由部长(实业部)商得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同意后委派。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地质调查所改隶农矿部，月给经费1千元，入不敷出，困难万状。有次，翁赴南京述职时，因身无余钱，只能蜷缩在鼓楼城楼上，与流浪汉席地为伍。由于如此克己奉公，埋头工作，得道多助，终于取得社会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陆续资助，办成了地震、燃料、土壤和新生代等在我国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室，在北平添修了陈列馆、图书馆，在南京建造了地质调查所新址。

1931年“9·18”事变发生，全国人心激动，翁博士为爱国热忱所驱使，走上了人生的一大转折时期。他同丁文江、胡适、蒋廷黻、傅斯年，吴景超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他们的意愿是：“重在唤起人心，共保国土。主张实行民主政治，发展科学，进行经济建设，发扬国力，保固疆域……”。

(二)

1932年夏，蒋介石派其秘书钱昌熙至北平，邀请翁文灏

赴庐山牯岭会晤，商谈国是。

谈话中，蒋慨然以保全国家为己任，声称：“欲尽此职，深愿延揽‘全国贤才，竭其所能’”。翁对蒋的态度颇为信实，遂力陈：“国家必须建设，建设须有目标，标的既定，则力能集中而功效加速，方法适当，则进行顺利而绩效可期。”翁又说：“国家建设要认识基础，因就我国矿产资源，水土丰瘠，分别区域，说明概要。惟知实地基础，庶免空中楼阁”。蒋又表示要在参谋部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由蒋自任会长，请翁任秘书长，翁辞以任职地质调查所已历有年数，不宜半途而去。几经商酌，蒋仍执意秘书长一席非翁莫属，但可以钱昌照为副秘书长，在京执行职务，翁仍暂留北平，主持地质所事务。从此，翁和蒋在政治上开始了从属关系。

1935年10月，翁文灏正式出任蒋的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以学者进入政界要津。

1937年4月，他以孔祥熙的特使秘书长同去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行前，蒋介石给翁文灏的秘密使命，为访问欧洲各国朝野要人，探询一旦中日关系恶化，这些国家可能采取的立场和方针，名义上是考察经济建设。当翁历访英、法、德、苏四国，在抵达苏联时，我国全面抗战爆发，他迅即返国，于飞往南京途中，在机上写了首“东望沪战”的七律：

“滔滔浪水大江东，兵革春申奋斗中，早该弹丸破割据，暂除侵略抗强雄。神州命脉竞争烈，华国英豪肝胆忠、我亦应捐微顶踵，齐心看取九州同”。他并将“中福公司”的分红一万元，悉数购买了救国公债，决心全力投入救亡图存的洪流。

(三)

抗战八年（1937—1945）期间，翁文灏在重庆任经济部部

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工矿调整处处长，领导大后方的经济建设工作。1939年4月，翁有题名“痛哭”一诗，可窥其时心境之隐，诗曰：

“涕流太息贾长沙，此恨于今更有加。天子多才重贵戚，王公有意植私家。官僚贪污民应弃，国命陆危我独嗟。岂有覆巢存完卵，前途可畏是中华”。

抗日战争胜利，翁文灏辞去了各种职务，筹组中国石油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1948年6月蒋介石为争取美援，授命翁任行政院长。翁11月辞职。1949年2月李宗仁任代总统，翁文灏就任总统府秘书长。国内政局进入严峻阶段，翁文灏虽一度“入阁拜相”，但手中端的是一杯难饮的苦酒，终于5月间借道香港转赴巴黎郊外暂住。

(四)

全国解放，翁文灏蛰居海外，心向祖国。在陈毅同志关怀下，翁文灏表示：“新民主主义渐近于社会主义，实为民族前进宏开极大机会。凡属中国人民皆有一体参加，共同用力之任务。……愿得改善之时。余年虽六旬，亦当勉为追随，不敢自外”。他毅然离开法国，冲破种种阻拦，于1951年3月返抵北京。

1954年12月，由周恩来总理提名，翁文灏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56年3月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委。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充分肯定卫立煌和翁文灏都是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要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受到非凡的鼓励。

翁文灏定居北京后，克服资料缺乏的困难，凭借深厚的功底，孜孜不已地从事大量翻译工作。其中有三部书，即施罗克著的《层状岩的层序》，马柯威著的《石油矿床学》和高盖尔著的《构造地质学教程》。此外散见于《地质译丛》和《石油译丛》两刊的翻译文字在千篇以上，总数约一百万字。他还在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的同时，认真阅读中国历史，写了四十万字的心得笔记，其中用他渊博的新生代与考古知识写的“史前史”与“上古史”，尤为不同凡响。

1971年1月，翁文灏因动脉硬化，脑血供应不足，病逝于北京，终年82岁。

在此之前，翁之心血管病日趋严重时，自感终将不起，曾先后三次留下遗言，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希望其后代子孙听党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并表示死后火葬，骨灰归之大地，不开追悼会，又将积蓄的六万余元捐献给国家。

翁文灏的身后，周恩来总理极为关怀，签阅了翁的遗嘱，由《人民日报》摘要发表，指示将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灵堂。1972年翁文灏长女翁慧娟由美返国，曾到八宝山翁之灵前瞻仰，她见到在同一灵堂内，安放众多的党内已故的优秀老干部，深受感动。

1985年，翁之骨灰盒，由家属移葬于李大钊陵园（原万安公墓）中，与夫人林韵秋合安窆所。

（五）

翁文灏生前的学术成就，受到国内外的重视。他曾多次代表我国地质学界出席国际学会，宣读论文。他与章鸿钊、丁文江、李四光同被公认为我国地质科学的四大泰斗，他还是我国地理科学的创始人。作为中国老一辈的科学家，翁文灏的严谨治学态

度，创新思想，密切地联系国家经济建设，重视人才培养与普及科学知识，他刻苦创业的献身精神，是值得我们纪念与借鉴的。

尊重科学实践，创立学术理论。翁文灏重视野外实地调查和室内化验等科学实践，这是他能创立新的学术理论，正确处理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原因。他自述诗《洄溯吟》：“自问生平乐事秋，纵横禹甸作良游。岱宗晶石由来古，嘉峪关门隔望悠。辽水丰盛藏铁质，贺兰农垦展平畴。携锥负籍宗邦计，愿尽终身地宝求。”1921年当他从事甘肃大地震调查时，因长期缺乏营养，步行蹒跚，但仍坚持不懈，终于成为我国实地调查大地震的第一位地质学家。

甘肃特大地震，发生于1920年12月16日，震级八点五级，死亡二十余万人。翁在调查之后，深以地震为害之烈而震惊，在撰写详细的地震调查报告之外，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地震的论文。他运用丰富的国学知识，根据历史记载的三千五百余项地震的地点和灾况，结合当地的地质构造，总结出我国四十六条地震带及其频发次数，发表了《中国震中地域及其地质》，

《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等重要论文，这是我国科学家利用国内特有的丰富历史记载，进行现代科学研究的首次成功的范例，在世界科坛上曾引起极大的震动，并且开辟了一条新的科学研究蹊径。他指出：“地震现象在地理上的分布较有规律可循”，“应该一凭历史经验，二凭地质构造来进行分析”。由于这个辉煌的成绩，地质调查所获得林行规先生的巨额捐款后，就在北京郊区建立了“鹫峰地震研究室”，里面装配了我国能纪录全世界大地震的第一批仪器，开始有了地球物理研究的手段。并有专门出版物与国际上各大地震观察台（站）交换，使我国地震研究跻身于世界行列之中。1922年，他参加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十三次国际地质学会，改变了原由使馆

人员作象征性代表的局面。翁在会上宣读的《中国地质构造对地震区分布之影响》论文中，首次以大量史料及最近的大地震材料，说明远离海岸线的内陆区也有地震频繁区域，用地质构造说明的地震原因，引起与会者的震动。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评议员及副会长，是我国地质学家首次获得的殊荣。

（六）

翁文灏主持地质调查所的一大特点，是坚持从实际出发，从不人云亦云，更不作空洞的揣测。他主张：“资料未尽确定以前，不宜空谈建置。”正是这些翔实可靠的地质资料，在解放以后的建国初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他创立的“东亚燕山运动”学说，阐明了亚洲东部侏罗纪和白垩纪间有造山运动。这一地壳运动在我国东部固然非常明显，在东亚也普遍存在；但是过去国外学者受欧洲阿尔卑斯运动成说之囿，很少注意。1926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三次太平洋会议，提出《中国东部中生代之造山运动》论文，受到与会各国地质学家的极大重视，被名之为“燕山运动。”会后，美法各国代表纷来中国考察。1928年，他复以国家首席代表资格出席在万隆召开的第四次太平洋科学会议，提出：“中国之拉拉米特造山运动，”会后并参加爪哇的地质考察旅行，证明也有“燕山运动”的现象。嗣后苏联远东地质也有同样发现。至此，“燕山运动”遂为世界各国所公认，并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地质特征。这个理论是我国学者对世界造山运动研究的一大贡献。此一学说，迄今仍是研究中国和东南亚构造地质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另一方面，他指出我国造山运动也有欧洲阿尔卑斯的某些特点，提出中国“纳布(Nappe)”构造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国东部断层不但上下升降，间亦

左右旋。1923年，他发表了“华北水平运动形成构造”的学说。这类构造有很大的现实经济意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在纳布构造下盘找到大油气田。

(七)

提倡经济地质，创建基本工业。在他领导下的地质调查所，当时的首要任务是测制全国地质图。这是一项默默无闻的基础性工作，任务特别艰巨，在发达国家也需要动员全国力量，化费二、三十年时间才能完成；在我国由于幅员辽阔，交通艰难，又是从无开始，就更加困难了。地质调查所在人员、经费均极匮乏下，只能由点及面分区进行。在调查中他特别强调注意各种矿产的分布。到“七·七事变前，已经调查了除西藏、新疆以外所有行省的部分地区地质，并印行了附说明书的“中国百万分之一地质图”。他一贯重视具体深入地研究我国经济地质。早在任地质研究所时，就曾利用暑假与丁文江一起赴察哈尔、绥远一带考察，为平绥铁路寻找煤田，行程直至大青山。地质调查所成立后，多次主持编辑《矿业纪要》。在《涸溯吟》中他写道：“识力为民应致用，精研有物不虚埋。”后有自注：“致力民生，方成实学；脱离现实，便陷空虚。”所以他在听到蒋介石决心要保卫整个国家后，就立即建议在内地建立基本工业（即重工业），并提出具体的设想方案。抗日战争爆发后，更为之操劳不止。

我国北部各省，富有煤炭资源，翁除曾往察绥一带考察外，还专程在冀、晋、辽、吉等省亲自调查煤田。1926年翁发表了《中国石炭之分类》一文，提出不同种类煤炭的定名与符号，被工业界广泛重视为一篇权威性文章。同年，他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世界能源会议上提出“中国煤炭资源初步估计的修

正报告”。1933年在太平洋科学会议上，他和侯德榜博士又提出“中国煤炭资源新的估计”。当他1926年去吉林考察时结识了穆陵煤矿矿长孙越崎。孙遂成为他的好友和得力助手，并在整顿焦作中福煤矿，开发天府煤矿和玉门油田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八)

翁文灏还是我国研究石油地质学的倡导人。早在1921年，他就派谢家荣往玉门考察油田，谢发表的《甘肃玉门油矿报告》是我国学者所写的第一篇关于石油地质的考察报告。1934年后，又先后两次派孙建初勘察玉门油田，派王竹泉往陕北勘探石油，派孙越崎和严爽实行钻探石油。1934年，翁文灏撰写了《中国石油地质问题》和《中国的燃料问题》。1930年，当地质调查所募得金绍基(沁园)捐款，成立“沁园燃料研究室”，得能从事对煤、石油以及制焦、炼油各方面的研究。研究室由谢家荣与金开英先后主持。鉴于当时我国发现的石油层甚少，在他赴欧考察时，曾特别注意德国有关人造石油的生产。抗日战争爆发后，燃料研究室内迁重庆。1939年，成立了动力油料厂，用热裂化方法使植物油转化为各种石油产品，解决了部分工业和军事上的需要。1938年，他还派黄汲清、王德纯勘探四川石油和天然气。黄、孙等的报告和图件都反映了当时我们经济地质学的最高水平。为了在玉门油矿钻井，翁文灏还在汉口同周恩来同志商定，从陕北拆运旧置的两部冲击钻机去玉门钻探。1962年2月，周总理在大庆油田接见石油工作者时，曾追述了亲自批准调派钻井队的过程，就是这个钻井队打出了玉门油田的发现井，因此可以说玉门油矿是当时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这个油田，不但为抗日战争增添了力量，而且还是世界

地质史上一个非海相油田的重要先例，它为大庆油田的发现排除了理论上的障碍。而通过开发玉门油田锻炼出来的队伍则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九）

在金属矿物资源的调查研究方面，翁文灏和地质调查所曾经做过很多工作。多次出版的《矿业纪要》对各种矿物的储藏和分布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他与其它科学家合作对许多经济矿物进行过研究。例如1926年对华北前寒武纪大理岩中含镁问题，1930年对华中、华北和蒙古几种刚玉的研究，1932年和谢家荣联名在第十五届国际地质会议上提出《中国硫磺工业和黄铁矿床》的报告等。资源委员会成立后，根据抗战的需要，对内地钢铁工业的开发，以及为取得抗战物资，对需要向美国和苏联出口的钨、锑、锡、汞等稀有金属矿的开采曾付出过极大的努力。

（十）

翁文灏在1954年写过题为“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这样一首诗：“顾念同胞六亿多，产粮田地得几何？农肥贵比连城璧，蒸庶繁如养鲫河。红土南方艰树艺，碱泥西域惜病疴。嗷嗷待哺黎民苦，生活提高事太苛。”并加注：“我国人数众多，粮食生产极应重视。”

早在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校刊上也早发表过《中国地理区域及其人生意义》一文中，就将全国土地划分为五类，做出我国人口过多，耕地不足，人均耕地面积极少的科学论断。1932年，他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进一步阐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1930年，中华教

育文化基金会拨款，委托地质调查所成立土壤研究室，周昌芸、常隆庆、侯光炯、李庆逵等先后在内工作，展开全国土壤调查。1934年，翁提出《中国土壤相关的人生问题》一文，阐述了土壤学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

(十一)

由于地质学内容广泛，我国早期的地质科学处在起步阶段，也有一些外籍专家参加工作。地质调查所的一名外籍顾问安特生(J. G. Anderson)，最先注意新生代的研究。1927年，安的助手师丹斯基(O. Zdansky)在周口店发现许多化石，其中有两颗人类牙齿的化石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于是由罗氏基金会资助，以周口店工作为基础，由地质调查所与协和医院合作，成立新生代研究室，协和医院解剖室主任步达生(Davidson Black)为名誉主任，杨钟健为副主任，裴文中做杨的助手，负责具体发掘工作。终于在1929年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骨，因而轰动全世界。在北京猿人发现后，他写文章说明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1930年他又发表《新生代研究室的组织和北京猿人的发现》一文，使我国古生物研究迅速达到国际水平。

按：这个被称“北京人”的中国猿人，距今约四、五十万年，他们已具备了人类的基本特征。在北京猿人居住的山洞里，还发现大量打制的石器，用火烧过而留下的灰烬和动植物化石等，是研究人类起源的重要科学根据，这从东方发掘出土的古生物，更充分有力的印证了恩格斯作的“人是由类人猿进化的”精辟之论。

1935年，翁与丁文江、曾世英合编出版了《申报》馆纪念成立六十周年的《中华民国新地图集》。这是我国第一本根据实测资料，按等高线，运用分层设色法绘制的现代化地图集。

(十二)

翁文灏一生的学术著作，是他的辉煌成就。

翁文灏一生以“攻苦食淡”的心志自励，不曲意徇物。

1941年9月，翁曾作“告贪官”诗一首，曰：“操守莫忘清白洁，人心终有是非存，口中有舌手中笔，直道于今仍足尊。”

翁文灏也是“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积极主张者，经历了数十年的歧途和彷徨，终能回到人民民主的营垒，是识别了民主与科学真谛所在的标志。对热衷于鼓吹和阿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们，不啻是一服有效的清醒剂。

